

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综述

孙伟琦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长期分散于词典学、词汇语义学、对外汉语教学与计算语言学等不同研究传统之中, 相关成果较为丰富, 但针对该类辞书核心编纂问题的系统综述仍较欠缺。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及相关研究文献为对象, 从概念界定、宏观结构、微观释义、教学适用性与数字化发展等方面梳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已有研究大体呈现出由编纂原则与辞书评介, 转向微观辨析机制分析, 继而延伸至语料库支持与数字化应用的演进趋势。总体来看, 学界已围绕同义与近义界定、收词与编组、词性处理、释义标示、例证配置、教学适用性、语料支持与数字化应用等问题形成较为稳定的讨论框架, 但仍存在概念边界不清、评价标准分散、跨词典比较不足以及用户研究薄弱等问题。未来研究宜在统一评价框架、强化语料驱动编纂、推进用户行为研究以及完善数字化知识组织等方面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同义词词典, 近义词词典, 词典编纂, 词汇语义学, 语料库词典学

A Review of Studies on Dictionaries of Synonyms and Near-Synonyms in Modern Chinese

Weiqi S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March 20,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Research on dictionaries of synonyms and near-synonyms in Modern Chinese has been conducted

across such fields as lexicography, lexical semantic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lthough relevant scholarship is substantial, systematic reviews 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s of compiling such dictionaries remain limited. Based on influential dictionaries and related studies since the 1980s, this paper reviews major developments in terms of conceptualization, macrostructure, micro-level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pedagogical applicability,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a shift from compilation principles and dictionary evaluation to semantic analysis, corpus-based compilation,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A relatively stable framework has emerged around issues such as synonymy and near-synonymy, headword selection, part-of-speech treatment, definition, illustrative examples, pedagogical use, corpus support,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However, problems remain, including unclear conceptual boundaries, fragmented evaluative criteria, insufficient cross-dictionary comparison, and limited user-oriented research.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unified evaluation, corpus-driven compilation, user studies, and the digital organization of lexicographic knowledge.

Keywords

Synonym Dictionary, Near-Synonym Dictionary, Lexicography, Lexical Semantics, Corpus Lexicograph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对象与文献范围

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与近义词词典位于词汇语义研究与语言应用实践的交叉地带。一方面，它们承接同义、近义等语义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服务于写作修辞、汉语教学、阅读理解、语言规范乃至自然语言处理等实际需求。正因兼具理论性与工具性，这类辞书可视为现代汉语词典体系中较能体现“语义分析向词典知识转化”的一类代表性辞书。高惠宁(2015) [1]在比较教学型近义词词典时指出，学习者对近义差异的把握并不主要依赖抽象理论，而有赖于词典能否提供可理解、可操作、可对照的辨析路径。由此可见，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是观察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如何走向应用化与系统化的重要窗口。

与普通语文词典研究或一般词汇语义研究相比，该领域成果长期呈现分散化状态。早期研究多以编纂经验总结和原则讨论为主，代表性成果如刘叔新(1982 [2]、1983 [3])和梅立崇(1988) [4]，主要涉及同义与近义界定、收词、编组、词性处理与例证配置等问题。进入 21 世纪后，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简明同义词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现代汉语同义反义词典》等代表性辞书的个案评介，并进一步细化到形容词释义、释同标示、多项式词群等微观问题(李智初，2009 [5]；于峻嵘，2014 [6]；蔡仲凯，2014 [7]；程慧敏，2018 [8])。与此同时，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方法与数字化应用的介入，又推动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由传统词典学内部议题逐步扩展为跨学科问题域(高惠宁，2015 [1]；杨帆，2021 [9])。从总体上看，现有成果并不匮乏，真正不足的是缺少能够围绕核心编纂问题整合既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

评介性文献虽未必直接讨论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的微观编纂问题，但对界定研究外延仍有参考价值。围绕《现代汉语特殊同义词词典》《同义词大词典》《同义成语词典》[10]等专题辞书的评介表明，同义词辞书的编纂形态并非单一，而呈现出专题化、专类化与知识复合化的发展趋势(高莉琴，2001 [11]；李

开, 2004 [12]; 萍庵, 2011 [13])。

以《简明同义词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等代表性成果为中心, 围绕词性、释义、教学与语料等问题的后续研究逐步形成了可相互印证的问题链条(苏新春, 2015) [14]。这说明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并非零散书评的简单累积, 而已初步形成具有传承关系和问题延续性的研究传统。

本文所称“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 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开出版并在学界或教学实践中具有一定影响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近义词词典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古汉语同义词辞书、文化类同义词辞书、类义词典及其他语义分类辞书, 不列入本文的核心综述对象; 相关成果仅在必要时作为边界参照, 不作专门展开。

1.2. 综述思路与文章结构

本文兼顾研究演进线索与问题分类线索, 但具体论述以问题类型为主, 而不按历史阶段逐章展开。在此框架下, 现有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四个层面: 一是同义与近义的概念界定及其对辞书编纂的影响; 二是同义词词典、近义词词典的收词、编组、词性处理与体例安排; 三是释义语言、标示系统、例证设计和形容词辨析等微观结构问题; 四是教学场景、语料库方法与数字化应用。下文将依次梳理这些研究的主要进展、内在张力及共同局限, 以呈现该领域已经取得的推进及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 同义与近义的界定及其辞书学意义

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的第一个基础问题, 并不是如何解释具体词条, 而是如何界定研究对象本身。刘叔新(1982) [2]较早提出, 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同义词”, 否则收词与编组无从成立。在他的论述中, “所指对象同一”与“意义基本相同”构成同义关系的两个核心条件, 而近义词则只是意义接近但对象并不完全同一的词。这个区分并非纯粹的术语争议, 而直接决定词典边界: 若把近义泛化为同义, 则收词范围会无限扩张; 若把同义收得过严, 则词典又会丧失应用价值。梅立崇(1988) [4]进一步把这一问题落实到编纂操作层面, 指出同义词词典必须在“失之过宽”与“失之过严”之间取得平衡, 否则无论编组还是辨析都难以成立。因此, 关于同义与近义的界定, 学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本体论判断, 而是词典能否形成稳定、可执行的准入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概念边界研究在现有文献中并不只是术语辨析问题, 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在于明确不同词典类型的对象范围与功能定位。就本文所讨论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而言, 同义词词典的中心任务是“同中求异”, 近义词词典则更强调使用条件、搭配限制和语境差异的细化揭示。如果二者的对象界限处理不清, 词典的编排方式、条目密度、例证选择乃至目标用户定位都可能出现偏差。从这一意义上说, 边界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给出抽象而固定的定义, 而在于为词典编纂提供稳定、可操作的准入标准。现有研究已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初步理论基础, 但如何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编纂指标, 仍有待深入研究。

3. 编纂原则与宏观结构研究

在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中, 编纂原则始终构成一条较为稳定的主线。刘叔新(1982 [2]、1983 [3])关于同义词词典的两篇代表性论文分别从词性处理和整体编纂原则入手, 奠定了这一主线的理论框架。他认为, 同义词词典的核心工作并不抽象, 主要体现在收词、编组与辨析三个层面; 其中每一步都以对同义关系的严格限定为前提。这种论述取向的意义在于, 它推动同义词词典编纂由较多依赖经验汇编, 转向强调规则意识与操作标准的学术实践。梅立崇(1988) [4]的《同义词词典编纂散论》虽更侧重经验总结, 但其所强调的“收词编组 - 例句搜集 - 释义辨析”三者联动, 实际上与刘叔新的原则框架

形成互补：前者突出操作重点，后者提供判断依据。从学术史看，20世纪80至90年代相关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推动同义词词典编纂由“依凭语感”转向“强调规则”。

收词与编组问题是宏观结构研究中最突出的议题。刘叔新(1983) [3]强调，收词不能只看形式接近或日常混用，而必须看其是否共享基本对象域；这一要求直接决定哪些词可以进入同一组，哪些只能构成近义词而不能构成真正的同义群。梅立崇(1988) [4]则更加关注收词尺度的调节问题，特别是方言词、旧词、外来词、书面语与口语材料如何进入同义词词典，需要与词典功能相匹配。到了以《新华同义词词典》为中心的研究阶段，这一问题又被具体化为词群组织和版本修订的能力问题。孙道功(2007) [15]认为，《新华同义词词典》相较前期成果的重要推进，不仅体现在规模扩展，也体现在体例统一、读者意识增强以及材料处理方式更趋规范；李智初(2009) [5]指出，该词典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收词范围、辨析维度和语料来源的同步拓展。这些讨论表明，宏观结构研究并非只关心条目“有多少”，而是关心词群是以何种语义原则被组织起来的。

从词群内部构成看，仲崇山(2010) [16]以《简明同义词典》为个案提出“同一语素”现象，即同一组同义词中反复出现音同形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语素；该研究还指出，同一语素在词群中的分布具有一定对应性，并受特定条件限制。这一观察提示我们，同义词组的组织并不完全建立在整词层面的语义比较之上，语素层面的对应关系也可能参与词群建构。

从现有文献看，多项式词群和“一词多见”现象，是宏观结构研究中最能体现问题复杂性的两个切口。于峻嵘、赵欣欣(2010) [17]通过考察《新华同义词词典》中的多项式名词同义词指出，同义词研究不宜长期停留在二项对举模式上，因为词汇系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本质上呈现为多成员网络，核心词、边缘词与群内层次由此自然显现。赵欣欣、于峻嵘(2011) [18]关于“时间”词条“一词三见”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词群划分不仅是数量安排问题，更是义项边界、语体条件与搭配限制交互作用后的组织问题。与此相近，于峻嵘、赵欣欣(2010) [19]对《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弱”义组的考察也表明，现有词群划分是否合理，不能仅凭形式相近或直觉上的语义接近来判断，而必须接受语料调查、语义比较和语体分析的共同检验。该研究指出，相关词群原有的三项式收录理据并不充分，词群关系有必要依据内部关联强弱重新压缩和调整。这进一步说明，同义词组的建构并不是静态归并，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校正的结构化过程。早期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原则，后续围绕《新华同义词词典》的研究则把这些原则推进到了“如何处理复杂词群结构”的层面。

不过，现有宏观结构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多数结论主要来自单部词典内部的封闭域分析。无论是对《新华同义词词典》的研究，还是对多项式词群、“一词多见”等现象的总结，普遍缺乏与其他同类词典的系统对照。换言之，现有研究较清楚地说明了某些代表性词典如何组织词群，却尚不足以判断这些组织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宏观结构研究若要进一步深化，便不能停留于代表性个案的归纳，而应转向跨词典比较与统一评价标准的构建。正因如此，现有成果虽足以支撑相关学术史叙述，却尚不足以形成规范意义上的编纂模型。

4. 微观结构研究：释义、标示、例证、词性与形容词辨析

与宏观结构相比，微观结构研究更能直接体现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的专业难度。关于《简明同义词典》的评介早已概括出“同中求异”这一核心原则：如果词典只说明一组词“相同”，其存在价值便会大为削弱；只有将相同之中的差异揭示出来，词典才能真正实现辨析功能(卢润祥，1983) [20]。王迎春(2005) [21]以《简明同义词典》569组同义词为封闭域进行统计和归纳，进一步概括出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在语义侧重、搭配限制、语体色彩和适用对象等方面的若干基本方法与策略。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再停留于对代表性词典的笼统评价，而是尝试从个案中抽绎出可供教学与编纂借鉴的辨析路径。就微观结

构研究的基本共识而言,同义词、近义词词典必须把“差异说明”置于条目设计的核心位置,而不能将其作为附属内容处理。

在实际研究中,释义语言本身已逐渐成为独立议题。于峻嵘、董文霞(2015) [22]指出,同义词词典释义不宜仅依赖编者的自然语言直觉,而应建立受控、可重复使用的释义元词系统,以减少循环解释和不必要歧义。进一步考察《新华同义词词典》中“换用”“适用”等标示语的研究表明,这些提示语并非附属说明,而是承担着限定替换范围、语境条件与搭配约束的重要功能(于峻嵘,2014 [6];于峻嵘等,2015 [23])。

此外,蔡仲凯、李贝贝(2013) [24]对《中华同义词词典》形容词释义指示语的分类统计表明,释义指示语不仅具有释同与辨异的功能,而且在同类条目之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重复模式,可据此概括词典内部释义组织规律。蔡仲凯(2014) [7]进一步指出,“形容”“指”“比喻”等提示成分自身亦可能存在边界模糊问题,因此标示系统不仅要有标示,还要保证标示语的清晰性、一致性与可区分性。这样处理,有助于把传统上常被视为编辑符号的内容提升为可分析、可比较、可修订的理论对象。

在微观层面,形容词始终是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蔡仲凯(2014) [25]和杨洋、陈华(2014) [26]都从不同角度指出,形容词释义之所以困难,不仅在于编者表述可能不够精确,更在于形容词所指对象常具有连续性、程度性和主观评价色彩,因而容易出现语义边界模糊。蔡仲凯(2014) [25]以《中华同义词词典》的三项式形容词为例,指出“区别释义”与“区别释义加用法说明”等模式虽已尝试细化差异,但仍常因例证不足、语境信息不充分而导致释义边界不清。蔡仲凯(2014) [27]对“深”义组在多部同义词词典中的释义比较后进一步指出,“释同”“释异”与配例并非彼此割裂的三个环节,其中配例实际承担着补足释义模糊的重要功能。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形容词辨析中的模糊性并不完全来自释文失当,也与例证是否能够有效补足语义边界密切相关。杨洋、陈华(2014) [26]则更明确地提出,模糊性并非形容词释义中的偶发缺陷,而是由认知对象与释义方式共同决定的常态。刘悦(2016) [28]以《汉语同义词词典》中的共素同义形容词为例,进一步把差异来源细分为理性意义、语用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层面,并指出其外部差异还常体现为适用对象、搭配对象和使用范围的不同。这类研究将共素与异素的内部构成关系引入释义分析,使形容词辨析由一般性的“有差异”推进到更细密的差异类型划分。由此可见,微观释义研究若要更进一步,不能仅以“消除模糊”为目标,而应转向“如何控制模糊”,即把必要的模糊保持在可解释、可使用的范围之内。

在这一问题上,于峻嵘、张淑明(2016) [29]引入阿普列相整合描写理论的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方法推进意义。研究认为,同义形容词的有效释义不应停留在义素罗列,而应整合语义、语法和使用条件,把词汇意义与句法行为、搭配倾向、适用对象等因素一并纳入释义程式之中。这种进路比传统释义学更贴近词典编纂的实际需求,因为读者查询同义词或近义词时,关心的并非抽象义项说明本身,而是某一词语在何种条件下比另一词语更为贴切。就研究史脉络而言,整合描写理论的引入标志着同义词辞书研究由经验性精细辨析迈向更具理论支撑的阶段。不过,这类研究的局限也同样明显:理论提升虽已发生,但从理论框架到可大规模复核的条目规范之间,仍缺乏充分的中介层验证。

微观结构研究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词性与例证。刘叔新(1983) [3]较早指出,词性虽然不应机械地作为同义关系的唯一判据,但又绝不能在同义组组织中被忽视,因为词性差异会渗入词义与搭配方式。在此基础上,徐今(2008) [30]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指出,同义关系的成立并不以词性相同为前提,因为词性属于句法范畴,与概念范畴并非完全对应;据此,同义词词典在必要时应允许收录词性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这一观点把词性问题从“是否一致”的静态判断,推进到“如何处理不一致”的编纂问题,从而显著拓展了同义词词典处理词性的理论空间。欧阳丽文、李仕春(2013) [31]对《新华同义词词典》的封闭域统计,则从另一侧证明词性并非边缘信息,而是同义词系统分布规律的重要维度。同时,杨帆(2021)

[9]、程慧敏(2018) [8]等人的研究都反复强调, 例句与搭配证据对于辨析质量的决定作用正在上升: 没有足够搭配和语境支持, 许多释义差异只能停留在编者经验判断; 一旦语料库介入, 词典的某些表述便会暴露出泛化和遗漏。综合来看, 现有微观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说明了一个事实: 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编纂真正的难点不在“给词下定义”, 而在于“用最经济、最稳定的方式把差异、限制与使用条件组织起来”。

5. 应用导向与方法转型: 教学适配、语料库支持与数字化发展

早期同义词辞书研究的重心在于编纂原则与词条设计; 近年来, 教学场景的介入与实证方法的引入, 使这一领域的学术关切发生了明显迁移。高惠宁(2015) [1]对五部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的比较表明, 学习型辞书的价值不在于收词量, 而在于辨析是否真正贴近学习者的偏误结构; 同样是解释差异, 有的词典偏重语义说明, 有的词典偏重语用条件, 有的则尝试通过例句和对译关系降低理解难度。杨帆(2021) [9]对《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 对外汉语语境中的近义词工具书往往需要把“学习者易混”本身作为收词标准之一, 而不能完全照搬本体语义学意义上的同义界定。这意味着, 教学型近义词词典并非一般同义词词典的简化版, 而是带有明确用户导向和功能导向的专门辞书。

在教学导向研究中, 释义语言控制成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张静静、赵新(2011) [32]的研究提醒人们, 面向二语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词典如果在释义和例句中使用过难、过生或未分级控制的词汇, 即使其辨析本身准确, 也会因可理解性不足而削弱实际效果。这一观察实际上补充了传统同义词词典研究常被忽略的一面: 同义词、近义词词典不只是研究者之间的知识表达, 还必须是面向用户的知识转译。因此, 判断一部教学型近义词词典优劣的标准, 不能只看学理深度, 还要看其释义语言是否可控、例证是否贴近真实偏误、辨析路径是否适合目标读者。现有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但多停留在宏观比较和实践总结层面, 真正基于学习者查询行为和使用效果的研究仍然偏少。

与教学转向并行推进的, 是语料库方法对同义词、近义词辞书研究的重塑。程慧敏、张翠翠(2018) [8]以三组词为例, 对《现代汉语同义反义词典》进行了语料比对, 发现传统词典在搭配对象、义项分布和使用强度上的某些处理并不充分, 而语料库能够提供更细密的证据支持。杨帆(2021) [9]也在教学型辞书评介中提出, 语料库在例句选择和搭配描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因为它能把“编者感到有差别”转化为“证据显示差别如何分布”。李智初(2009) [5]对《新华同义词词典》创新的总结, 同样把语料调查视为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上述研究的规模和深度虽不尽一致, 但所揭示的发展方向则颇为一致: 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正在从经验型辨析向证据型辨析转移, 语料库的地位已由辅助手段上升为评价与修订词典的核心依据。

数字化发展进一步扩展了该领域的问题空间。需要说明的是, 苏新春(2008) [33]讨论的《现代汉语语义分类词典》(TMC)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词典或近义词词典, 但其在语义组织、层级控制与机器可处理性方面的问题, 与同近义词关系资源建设具有方法上的相通性, 因此可作为邻近参照。该研究表明, 语义资源建设相较传统纸本辞书对系统覆盖、层级组织与结构化表示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为它既要服务人工查询, 也要支持机器处理。从这一角度看, 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的未来已不仅是纸本修订的问题, 更是语义知识如何实现结构化与可计算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现有文献对数字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语义分类词典和语料支持, 对更大范围的智能语义服务尚未形成成熟理论; 换言之, 技术实践已经推动了研究问题的扩展, 但系统性的词典学回应仍然不足。正因为如此, 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在今天面临的并不是“是否数字化”的选择, 而是“如何在数字化条件下保持语义辨析的可解释性与规范性”的新课题。

6.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就现有研究的总体格局而言,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已积累了较为完整的问题谱系,但其内部仍存在几个长期未被真正解决的结构性缺口。

首先,评价框架尚未统一。早期原则研究、后来的词典评介、近年的语料个案和教学比较虽然都很有价值,但彼此常常使用不同的评价尺度:有的强调所指对象是否同一,有的强调使用限制是否清楚,有的强调例证是否充分,有的则强调是否适配学习者。这些标准并非互相排斥,却缺少整合,结果是不同研究对同一部词典的评价常常难以比较。未来研究若要真正推动编纂规范化,必须在收词、编组、释义、标示、例证和用户适配之间建立一套层级清楚、可以复核的综合评价框架。

其次,跨词典比较研究仍显不足。现有研究虽然围绕《简明同义词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现代汉语同义反义词典》等个案积累了大量见解,但多数研究仍采取单部词典封闭域分析的方式。结果是,我们对“某部优秀词典为何优秀”理解较多,对“不同类型词典在同一问题上如何分化”理解较少。高惠宁(2015) [1]的比较研究已经证明,多词典并置能够更清晰地揭示教学型近义词辞书之间的功能差异;类似方法若被推广到普通同义词词典、专题同义词词典和数字语义资源,应该能显著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因此,未来的重点不应只是继续增加新个案,而应扩大可比较样本,形成真正的横向分析。

再次,用户研究与使用数据仍是这一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教学型词典研究已经较早意识到用户对象的重要性,但就现有成果看,学习者查询路径、误用修正效果、本族语写作者需求、翻译者使用情境乃至机器系统对同义资源的调用方式,仍然缺少系统实证。张静静、赵新(2011) [32]关于释义语言控制的讨论,高惠宁(2015) [1]关于教学近义词词典功能差异的总结,都提示用户因素并非附属变量,而是辞书设计的内部条件。如果缺少真实用户数据,很多所谓“实用性判断”就只能停留在编者推测。因此,从用户行为出发重建同义词、近义词词典评价体系,应是未来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方向之一。

最后,理论整合与数字化规范之间仍存在明显断裂。于峻嵘、张淑明(2014 [34]、2016 [29])关于整合描写与同义形容词释义的研究,已将微观释义推进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但从理论模型到大规模条目规则,再到数字平台中的稳定实现,中间仍缺乏可操作的实施路径。换言之,未来研究的关键不只是继续引入新理论或新技术,而是把“理论可解释性”“编纂可操作性”“数字可实现性”三者放在同一框架下考察。只有如此,现代汉语同义词、近义词词典研究才可能从个别高质量成果的累积,走向稳定的方法论建设。

7. 结语

综上,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与近义词词典研究已由早期的编纂原则讨论,逐步拓展为涵盖代表性辞书评介、微观释义机制分析、教学适用性考察以及数字语义资源建设的复合型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已较充分地表明,这类辞书的核心任务不在于简单“释同”,而在于通过收词、编组、标示、例证与使用条件说明,将词义差异转化为可查询、可理解、可应用的知识形式(刘叔新,1983 [3];李智初,2009 [5];于峻嵘,2014 [6])。但与此同时,概念界定、评价框架、用户研究与数字化规范之间仍存在若干关键缺口。未来若能在统一评价标准、强化语料证据、重视用户行为并推进结构化知识组织等方面继续深入,该领域有望进一步提升其理论整合度与应用效能。

基金项目

鲁东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人体部位喻人范畴名词的词汇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IPGS2025-006。

参考文献

- [1] 高惠宁. 对外汉语教学近义词词典比较与分析[J]. 语文建设, 2015(8): 57-58.
- [2] 刘叔新. 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J]. 辞书研究, 1982(1): 55-65.
- [3] 刘叔新. 同义词词典怎样处理词性[J]. 辞书研究, 1983(3): 3-11+50.
- [4] 梅立崇. 同义词词典编纂散论[J]. 世界汉语教学, 1988(2): 87-92.
- [5] 李智初. 同义词辨析词典编纂的理论与创新——谈《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J]. 辞书研究, 2009(3): 85-93.
- [6] 于峻嵘. 同义词的释同标示研究——关于“换用”[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7(5): 23-31.
- [7] 蔡仲凯. 《中华》三项式形容词释义指示语模糊性研究[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4(9): 20+59.
- [8] 程慧敏, 张翠翠. 基于语料库初探《现代汉语同义反义词典》——以“喜爱-酷爱”“才能-才华”“安静-宁静”为例[J]. 现代语文, 2018(1): 31-38.
- [9] 杨帆. 《1700对近义词语用法对比》体例管窥[J]. 河西学院学报, 2021, 37(1): 96-101.
- [10] 焦冬梅, 刘学文. 语言世界中的异同和相反对待之辨——读《同义成语词典》和《反义成语词典》[J]. 辞书研究, 2008(1): 96-101.
- [11] 高莉琴. 《现代汉语特殊同义词词典》评介[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2): 140-142.
- [12] 李开. 求精求实之作——评《同义成语词典》[J]. 辞书研究, 2004(3): 78-83.
- [13] 萍庵. 十年磨一剑, 辛苦不寻常——《同义词大词典》读后感言[J]. 辞书研究, 2011(3): 141-150.
- [14] 苏新春.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舞者——张志毅教授[J]. 辞书研究, 2015(2): 76-82.
- [15] 孙道功. 《新华同义词词典》评介[J]. 辞书研究, 2007(6): 95-101.
- [16] 仲崇山. 试论同义词里的同一语素——以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为个案的研究[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 31(4): 56-60+89.
- [17] 于峻嵘, 赵欣欣. 多项式名词同义词之溯源研究——以《新华同义词词典》为例[J].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10, 30(4): 16-18.
- [18] 赵欣欣, 于峻嵘. 《新华同义词词典》“一词三见”研究——以“时间”同义词为例[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2): 104-107.
- [19] 于峻嵘, 赵欣欣. “弱”义组同义词释义关联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5(5): 112-116.
- [20] 卢润祥. 浅论“同中求异”——评介《简明同义词典》[J]. 语文研究, 1983(2): 68-69+38.
- [21] 王迎春. 《简明同义词典》探析——兼论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的方法与策略[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5(10): 67-71.
- [22] 于峻嵘, 董文霞. 元语言理论与同义词释义的结合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3): 18-21+2.
- [23] 于峻嵘, 张瑞洋, 彭鲁迁. 同义词释义与“各有所宜”——《新华同义词词典》“适用”标示分析[J].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5, 18(2): 136-146.
- [24] 蔡仲凯, 李贝贝. 《中华同义词词典》形容词释义指示语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 2013, 33(6): 60-64.
- [25] 蔡仲凯. 《中华同义词词典》三项式形容词与释义模糊研究[J]. 铜仁学院学报, 2014, 16(1): 105-108.
- [26] 杨洋, 陈华. 论语文词典中形容词释义的“模糊性”——以《同义词词典》中形容词释义为案例[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5(5): 10-12.
- [27] 蔡仲凯. “深”义组同义词释义模糊研究[J]. 枣庄学院学报, 2014, 31(1): 28-30.
- [28] 刘悦. 共素同义形容词的区别性特点与释义——以《汉语同义词词典》为例[J].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6, 32(1): 13-15+63.
- [29] 于峻嵘, 张淑明. 语言的整合描写与同义形容词释义[J]. 河北学刊, 2016, 36(1): 212-215.
- [30] 徐今. 同义词和词性——兼谈同义词词典处理词性的问题[J]. 辞书研究, 2008(1): 42-47.
- [31] 欧阳丽文, 李仕春. 从词性的角度看现代汉语同义词的分布规律[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3(2): 82-85.
- [32] 张静静, 赵新. 外向型汉语词典用词用字探析[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1(1): 52-58.
- [33] 苏新春. 《现代汉语语义分类词典》(TMC)研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中文信息学报, 2008(5): 12-21.
- [34] 于峻嵘, 张淑明. 阿普列相整合描写理论与同义形容词的释义程式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9(4): 99-104+160.